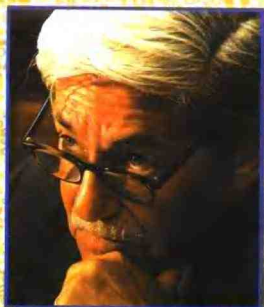


百家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生三昧

人本主义经济学



张理智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百家讲坛·世纪

百家讲坛·世纪中国系列讲座

人本主义经济学



张其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百家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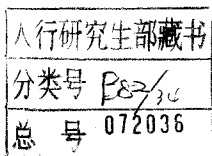
072036

人本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生三昧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研究成果)

张理智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本主义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生三昧/张理智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4

ISBN 7-5017-4161-1

I. 人… II. 张… III. 人本主义-人生观-经济学家, 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通俗读物 IV. B82.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220 号

人本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生三昧

张理智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地质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印张 158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17-4161-1/F·3017

定价:14.5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从解释日常生活出发,介绍了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引人入胜的有趣见解。

本书从“经济学是人生艺术”、“游戏”、“命运”、“交往”、“福利”、“选择”这六个方面,说明任何个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为了保障通俗、有趣,全书没有采用一个数学公式,没有绘出一张几何图形,全用白话解说。因此,任何人,只要识字,即适合于阅读本书。

第一章 经济学是人生艺术

说到经济学，人们通常认为，这只是一门教人如何赚钱的学问，除此以外，与人的生活无关。这种见解，显然是由“经济学”这一名称顾名思义带来的误会。其实，教人如何赚钱，只是经济学众多功能中的一种。除此以外，它还教人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对待风险、如何投票、如何理解犯罪、欺诈等等。总之，人类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可纳入经济分析。

的确，以往的经济学一般只限于研究与赚钱相关的人类行为。但自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日益开拓视野，运用经济学一般原理，分析人的各种行为。不仅教人如何赚钱，而且，一般地教人在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一切场合（包括结婚、生育子女、助人为乐等等），如何尽可能多地赚取一切利益。经济学家这种赚取一切利益的开扩视野，发端于贝克尔所创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且说本世纪 60 年代初的某一天，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经济学家贝克尔驱车前往芝加哥大学参加毕业生论文答辩。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把车开往停车场，只好违反交通规则，把车靠在大街边上，匆匆赶往答辩会场。他一路走，一路想：乱停车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这种行为是否合乎经济学原理？对这种行为是否可运用经济学方法给以分析？以此类推，如果我是一名罪犯，我在采取犯罪

行为时是否也会像生意人那样作成本—收益分析?从此以后,他由这最初的念头出发,系统分析了犯罪、歧视、婚姻、家庭、生育、人力资本、利他行为、政治行为等等。最初,当他提出,现代社会中人们生育子女是把子女当作耐用消费品,因此其生育决策与购置耐用消费品决策在原理上相同时,受到许多同行耻笑。然而,历经几十年奋斗不息,他所提出的见解逐渐受到广泛赞同,他所创立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即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人们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也逐渐大行其道,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人们普遍同意他的下述见解:“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其实,许多年前,作为善于观察人类生活的文学家,萧伯纳早就指出:“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

经济学,作为人生艺术,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客观地解释生活,使人自觉地理解自己和别人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明智地投入往后的生活。

自古以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学说、教派,都试图解释生活,并都试图教导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些学说、教派,也曾征服过许多人,使其信奉、皈依,或甚至献身。所有这些学说、教派(其中特别典型且影响巨大、深远的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从根本上抛开各个人的直接生活本身,在生活之外或之上,确立一尊偶像或确立一种教义,作为人们生活意义的准绳或归宿。历史上,亿万民众以及历代帝王将相,都曾分别皈依不同学说、教派,并且自以为找到了具有崇高意义的生活真谛。其中,虔诚的宗教信徒,哪怕是信仰英勇献身,也无怨无悔,且含笑九泉。

1096年—1291年,千百万欧洲基督教徒为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组成十字军。风餐露宿,历尽艰辛,反复八次东征,延续近200

年。为了上帝，前赴后继，英勇无畏，虽死犹荣。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基督教徒个个不怕死，因为他们坚信，为上帝而死，死后会立即升入天堂。

在古代印度，时常举行殉教仪式——巨轮上安载印度教保护神毗瑟拏塑像，沿城市街道滚动前行。决意献身的教徒抢步上前置身于巨轮之下，心安理得地粉身碎骨。

历史上，忠心耿耿信仰某种学说或教派并为之献身，事例众多，不胜枚举。问题是：信仰、献身，这也是一种生活，并且是生活者自以为是的高尚生活。对这样的生活，我们也能用经济学来作出合理解释吗？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个人的生活，不论其内容如何，都是活生生的客观实在。如果作为人生艺术的经济学要想解释生活，它就必须也能解释基督教、佛教等等信仰者、献身者的生活，否则，它就不配解释生活。

的确，经济学所要解释的生活，本来就包含任何一种生活。哪怕是基督教徒、佛教徒等等的生活，也当然应被纳入，给以合理解释。不过，在对生活的解释上，经济学不同于基督教、佛教等等学说、教派，它不是首先在生活之外或之上确立偶像或教义，然后以此为前提来说明生活“应该是什么”，而是着眼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个人的直接生活本身，即着眼于投入任何一种生活的任何个人自身，来客观地说出各个人的生活“是什么”。

本着上述宗旨，经济学直接面对所有生活着的个人，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各个人自身在各自生活中共同遵循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为了便于分析，经济学家们首先提出“理性经济人”假定，即假定任何个人都充分理解自身利益所在，并都能采取正确对策去最大化地谋取自身利益。例如，一个私人企业家，他当然理解自身利

益所在就是谋求利润，他当然也会千方百计用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开支赚取尽可能大量的利润。

依照上述假定，的确能有效地解释大量生活真实。若不信，请去集市贸易市场看看，哪一个卖者不千方百计谋求多赚钱？哪一个买者不贪图价廉物美？为了多赚钱，许多小贩在秤上使假；为了不受骗，许多家庭主妇随身携带弹簧秤。这一切，难道不都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

为了证明理性经济人假定，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提出成千上万个具体例证。

然而，即使我们可以从生活中提取出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的亿万个具体例证，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归纳出称得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下命题——任何个人的生活都必定符合理性经济人假定？

很可惜，我们不能如此归纳。之所以如此，那是由于，从方法上讲，任何归纳都不可靠。英国科学家波普尔早就指出过，纵然是我们曾经发现亿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我们也不能肯定说“所有天鹅都必定是白色的”。如果我们贸然下此断语，则某一天若飞来一只黑天鹅（在逻辑上，只需要有一只即可），就立即证明我们先前所下断语是胡说。可见，归纳法的确靠不住。

在波普尔以前，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曾以下故事来说明归纳法之荒谬。

有一天，休谟家来了一位客人，向他宣扬归纳法是一种精妙的好方法。休谟听完客人宣讲，即不紧不慢叙述他的故事：我养了一群鸡，这群鸡都被关在围栏里喂养。每天早中晚三次，我都啪响一声打开围栏大门去给鸡送饲料，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于是，这些鸡只要听到啪响一声，就统统跑到围栏门口伸长脖子争食。昨天中

午,来了一位远客,我打算杀鸡款待他。于是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走向围栏。像往常一样,随着啪响一声,鸡群个个奋勇争先,伸长脖子。结果,跑在最前面,脖子伸得最长的那只,成了我的刀下鬼。显然,不是别的,正是归纳法害了它,使它命归黄泉。倘若它像我一样,不相信归纳法,想必今天还安然无恙。

由归纳法之靠不住,迫使经济学家们重新严格审查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翻来复去地研究这一假定,看它是否真能从一般或普遍意义上正确地解释生活。

通过反复研究,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发现,由于人们通常都不可能获得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并且,任何个人的大脑思维能力都有限,因此,任何个人,在一般条件下都不可能做到充分理性,而只能具有“有限理性”。正是这一发现,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举例来说,某个农民由于掌握信息不可能充分,自以为多种蒜薹可赚大钱,结果待到收获蒜薹时,才发现市场上蒜薹烂市,被迫贱价抛售,血本无归。这是由信息不充分造成他无法做到充当理性经济人的事例,同时也表明,以“各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这一命题,无法客观、普遍地描述生活。

再以下棋为例,不论是象棋、国际象棋,或是围棋,其着法都变化多端。哪怕是世界冠军,其思维能力也有限,也不可能做到充分理性地走出每一步棋。特别是,围棋可能着法超过 10^{600} (在 1 后面添 600 个零) 种着法。假定 100 亿人捉对厮杀,每天下棋 10 盘,任何两盘棋着法都不完全重复,即使从宇宙产生(即宇宙大爆炸)那一时间开始下起,至今约 150 亿年,再继续下 100000000 亿年,也还未下到 10^{30} (在 1 后面添 30 个零) 种着法的 $1/5$,离 10^{600} 种着法还遥远得很。可见,在下棋这种生活形式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具有充分理性,即使世界冠军也远远不能把棋理解透。以此类推,

人们在炒股、买彩票、做学问、寻找工作、做生意、结婚、教养子女等等行为上,面对无力计算清楚的众多变量,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理性,而只能像西蒙所指出的那样,最多只能具有“有限理性”,即在可能获得的信息条件下,依照有限的思维能力作出决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趋利避害。

如此说来,我们似乎可以放心地把西蒙的“有限理性”看作解释生活的可靠的一般原则,并似乎可以认定,这种一般原则会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人们的生活偏偏是那么多姿多彩,形形色色,变化万端。世上竟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仿佛故意与经济学家过不去,他们竟然在生活中违反有限理性。倘若果然如此,则我们无权指责说,这些人“生活错了”,我们更不能说“任何违反有限理性的生活都不算是生活”(人的任何一种行为,哪怕是违反有限理性的行为,都直接就是生活)。面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某些违反有限理性的行为,我们只好说,有限理性,是能解释一部分人类生活,但却无法解释所有人类生活。且看以下事例。

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无法克制的一时冲动行为或愚蠢行为,文学作品对这类行为多有描述。《水浒》中描写过宋江杀惜,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杨志挥刀斩牛二;《唐吉珂德》、《阿 Q 正传》中的主人公都很愚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观察到有人暴怒失态、酒后驾车这类行为。

此外,心理学家作过许多试验,发现许多场合下人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例如,给出如下两种选择:1. 100%的机会赢 1 万元; 2. 10%的机会赢 5 万元, 89%的机会赢 1 万元, 1%的机会不输不赢。若人是有理性的,哪怕仅具有有限理性,也应当选择 2, 因为选择 2 的期望值是 13900 元, 大于选择 1。然而, 参加心理试验的大多数

人都选择 1,这显然表明,人的行为不符合理性(或有限理性)。

弗洛伊德和后弗洛伊德心理学家坚信,人的行为并非全部都由理性计算或由具有明确意识的思考决定,人的许多行为都不知不觉地被潜意识或习惯(包括坏习惯)控制。明知吸毒、吸烟有害,但千百万瘾君子却偏偏要逆理性而行;明知酒喝多了误事,但许多酒鬼却偏偏要一杯又一杯地喝下去,直到烂醉如泥还硬充好汉说“我没醉”。心理学家还指出,人们买东西,也往往不是凭理性计算,而宁愿上广告的当。广告,也不是用理性计算来劝告人们买什么,而是利用人们非理性的潜意识,包括性、魅力、渴望、幻想和嫉妒来设计广告以勾引顾客,并往往因此得手。(有关广告的这番论述,可参阅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所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一书第 128 页)。没有哪个电视广告会如此策划:让一位丑陋无比的女子举着化妆品向观众说:“请用这家伙!”广告策划通常都是理性的(用优美、豪华的形象来吸引人并获得成效),但它所利用的却往往(当然并非全部)是人们的非理性(幻想、嫉妒等等)。

不仅个人行为,而且,在群体行为中,人们也可观察到非理性的人类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战争初期,德国千百万民众对希特勒敬佩得五体投地,以为遇到了救星。直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长驱直入打到易北河,苏军攻克柏林,德国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德国民众才认识到,当初把希特勒捧上天有多么愚蠢。中国历史上,历代封建帝王骑在百姓头上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但黎民百姓却把帝王当作天子来顶礼膜拜,他们的行为,也显然不合乎理性。

如此说来,不仅充分理性假设靠不住,而且,就连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也难以普遍有效地解释人类生活。面对如此困境,经济学家何去何从,才可望普遍有效地解释人类生活?

其实,仔细想来,充分理性也罢,有限理性也罢,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犯了前面业已述及的两大错误。这就是:第一,试图从众多个别的个人行为中归纳出一种统一的行为准则(即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结果是,无论可找到的“白天鹅”数量如何众多,也难以归纳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一命题,总会有一些“黑天鹅”(吸毒者、酗酒者、非理性选择等等)跑出来捣蛋,使“充分理性”、“有限理性”命题难以普遍成立;第二,“充分理性”、“有限理性”虽然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佛”,但总是含有教义味。试想,倘若人类行为真可以被“充分理性”、“有限理性”统一归纳,岂不就意味着,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应该是具有充分理性或具有有限理性的吗?于是,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岂不就成了人类行为的应有规则或应当遵循的教义了吗?也许,有人会说,用一种好的规则或教义(例如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来规范人的行为,有什么不好?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不是人类行为的好坏,而是说人类行为,即人类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只要有人不完全按照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生活,我们就得老实地承认,充分理性、有限理性不能普遍有效地解释生活。要想普遍有效地解释人类生活,就必须抛开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而寻找新的解释路径。

为了寻找到新的解释路径,我们需要首先问一问:老的路径(理性)为何走不通,它究竟是在哪里卡了壳?只有首先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才可望找到普遍有效地解释生活的新路径。

且让我们从“理性”本身说起。

“理性”,这个词包括多种含义。但经济学所言说的理性,指的是各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合理行为。具有这种特定含义的理性,虽然可在古希腊哲学家身上找到它的存在,但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最近两三百年间,它才大张旗鼓地登上历史舞台。

在西方,自耶稣以来,人类中的大多数信仰上帝;在东方,则有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在漫长岁月里指导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直到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后,人们逐渐疏远了上帝,才迎来了法国思想家在 18 世纪对理性的大肆宣扬。他们之所以宣扬理性,其意图在于,把人从上帝统治下解放出来,用合乎自然的人性来取代上帝的神性。他们宣扬天赋人权、宣扬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高举理性大旗,冲击一切以神圣的上帝名义树立起来的宗教、意识形态、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让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自身存在的权利。当代经济学中所言说的理性,其渊源即发端于 18 世纪法国思想家提出的与上帝神性唱对台戏的人性,其含义即指:人的行为不应当对虚无的上帝负责,而应当对自己负责,凡是有利于满足自我利益的行为,即属理性行为。充分理性即指人的行为总是为着最大化地满足自身利益,有限理性即指人的行为只能做到力所能及地满足自身利益。

后来,进入 19 世纪,到 1859 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提出物竞天择,又为现代经济学的理性(或有限理性)假设提供了新内涵,这就是:若人的行为不合乎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就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去。例如,一个人若胡乱花钱,寅吃卯粮,就难以存活;一家私人企业老板若胡乱决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就会在无情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即假设人的行为总是合乎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人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近两三百年来思想家们对“人”这一总问题的思考的延续。这种思考的基本思路是:1. 人应该打倒上帝;2. 人应当自立;3. 因此,人的行为本来就只能是力所能及地实现

自身的最大利益,否则就难以继续生存下去。这种行为所体现的就是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

然而,如前所述,现实生活中,人的许多行为却又偏偏违背理性。问题出在哪里?

仔细想来,问题的根子就出在对“人”或“人是什么”这一总问题的思考上。

在对“人”或“人是什么”这一总问题的回答上,主张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经济学家似乎走错了思维路径。其错误在于,把世界看作是确定性的,并由此把人看作如同一台按确定程序运转的机器。所谓充分理性或有限理性,不过是对“人这种机器的运转程序”的别称。(顺便提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为了打倒上帝,反抗宗教,就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人是机器》。他在书中指出,人和动物一样,也是机器,不过是人比动物“多几个齿轮”、“多几条弹簧”而已。可见,当代经济学家的理性假设不过是拉美特利思维路径的延续。)

把世界看作确定性的,从而把人的行为也看作如同机器一般具有确定性,这是由牛顿创立的自然科学体系在人们头脑中潜移默化逐渐形成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在英国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主义诗人薄柏的诗中以最准确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诗中写道:

你看那神奇的大链条,
把宇宙各个环节扣牢,
使伟大的整体连成一道。

按照牛顿科学体系,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确定性的因果联系,人的任何行为也被因果链条牢牢地扣住。

后来,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尽管实现了对牛顿时空观念的革命,但他仍然坚信,上帝不会随便掷骰子,这世界仍然是确定性的,

一切都在因果关系中秩序井然地存在。纵然面对量子力学的新发展,面对“薛定谔猫”和面对“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关于“薛定谔猫”和“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这里不必详述,留待后面说到人生命运时再具体说明),爱因斯坦也还是坚信:这世界是确定性的。为了维系这确定的世界,他甚至武断地在自己的宇宙方程中硬加上能够保证宇宙安然存在的“宇宙项”。直到后来,哈勃于1929年发现宇宙膨胀,爱因斯坦才意识到,宇宙项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实际上,我们这个宇宙本身就生得怪,它自己就以不确定的方式存在。诚如当今英国大科学家霍金所言:“所有证据表明,上帝是一位老赌徒,他在每一种可能的场合掷骰子。”当然,霍金所说的“上帝”,不是基督教徒所认定的那个他们自以为真实存在的上帝,而是一种对自然世界的比喻所称。

既然这世界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则牛顿的确定性世界、拉美特利的“机器式的人”、当代许多经济学家所假定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包括充分理性和有限理性),就统统摇晃起来,难以像铁板钉钉那样稳稳地“立正”。这里之所以不说它们“立即轰隆一声倒下来”,那是由于,在特定前提条件下,在有限范围内,它们确有几分道理。例如,在物体运动速度比光速慢得多的通常条件下,牛顿体系近似度极高,且方便适用,此外,人类的许多行为(虽然不是全部行为)也确实合乎理性。

也许有人会问,倘若这世界真是不确定的,为何打烂的陶瓷盘子碎片不会自己拼起来复原如初?为何烧过的煤炭渣不会自己重新变成煤炭?这种提问所含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世界是确定的,其中秩序井然,不会乱来。其实,读过《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这本书就会知道,碎片并非根本不会自己复原,炭渣也并非根本不会自己变成煤炭,一切物质粒子都在不确定性状态中运动,在这所有不

确定性中,就包含一种可能性:碎片自己复原,炭渣自己变成煤炭。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在概率上极小,小到哪怕是亿万年也难发生一次,使得整个人类自始至终都因时间太短暂而遇不到,从而才使许多人根据经验作出一种错误归纳:陶瓷碎片绝对不可能自动复原为盘子,炭渣绝对不可能自动变成煤炭。这种归纳思维方式,使我们回想起前面所述休漠养的那只挨了刀的鸡。

既然不确定性是世界存在的普遍法则,由此,我们即可从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普遍适用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和解释人类生活。

首先,让我们回到前面提及的“人是什么”这一总问题。千百年来,许多学派都曾试图正确回答这一总问题,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来回答一系列其他问题,但似乎都未获得成功。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到,各个宗教教派、18世纪思想家、当代主张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都未能正确或未能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哪一个学派敢于宣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彻底圆满的回答。不过,相对而言,似乎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比较令人满意(其中,萨特获诺贝尔奖,但他拒绝受领)。

以下,我们将借鉴(但并不照搬)存在主义哲学来展开分析。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只能回答说是“存在”。除此以外,无论我们怎么回答,都难免会掉进错误陷阱。不论把人归纳为单纯的“理性动物”还是单纯的“非理性动物”,也不论把人性归结为“善”或“恶”,只要给出一种具有具体属性的本质,就必错无疑。萨特的名言是:“存在先于本质。”

的确,人,就其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着落于宇宙中的“在”、“有”或“存在”,理性、非理性、善、恶等等都无法完整地表